

一杯水之愛

丁玲風流史(中)

● 姜 穆

武漢文藝戰線形勢

胡風和舒羣的糾紛，也是從「七月」開始的。

丁玲早於一九三七年前去了西北，「戰地」却掛上舒羣、丁玲主編，適巧丁玲從西北介紹一些朋友的稿給「七月」，當然也寫了信。胡風便在「七月」刊出了丁玲的信，證明丁玲人在西北，不可能在漢口編「戰地」，舒羣認為胡風挖他的創疤，因此與胡風幾乎大打出手。其實這件事現在看來，實在不值得反目。

這本是近乎兒戲之爭，不值一提，不過還是一樁有趣的事，我留在後面來談。

爲了瞭解戰時武漢印行的定期刊物、報紙副刊，作一敘述是必要的。不過資料有限，難免掛一漏萬，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爲了方便做形勢判斷，盡量把編輯人也列入，可以瞭解共產黨與國民黨對媒體掌握的狀況。不過在文藝戰線上的鬥爭，不如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衝突激烈，不大引人注意，反而把文化上、文

藝上的鬥爭情況忽略了。其實直到現在，仍沒有人重視文藝鬥爭的失敗，是導致一九四九年潰敗的主要因素。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

當時武漢的定期刊物如下：

一、「抗戰文藝」，「文協機關刊物」，老舍統其事，編輯有樓適夷、姚蓬子、蔣錫金。（以上三人均爲共產黨員）

二、「七月」，胡風向周恩來借錢辦的左傾刊物，胡風主編。由吳奚如代表共產黨過問其事。

三、「戰地」；以「西北戰地服務團」名義辦的共產刊物，由舒羣主編、丁玲掛名聯合編輯，蔣錫金代表共產黨過問其事。當時蔣錫金還是個預備黨員。

四、「文藝月刊」；屬國民黨的刊物，由王平陵主編。

五、「文藝」，由胡紹軒主編，傾向國民黨。

六、「彈花」，趙清閣主編，傾向國民黨。

七、「自由中國」；編輯無法查出，屬自由

派。

日報副刊方面：

一、「新華日報」副刊「團結」，樓適夷主編。

二、「大公報」副刊「戰線」，陳紀滢主編。

三、「武漢日報」副刊「鸚鵡洲」，段公爽

主編。

四、「掃蕩報」副刊「野營」、「瞭望哨」

，鍾期森等主編。

從以上的報刊來看，共產黨員編的或出資的定期刊物三個，國民黨三個；報紙副刊方面，共產黨一家，國民黨三家。由此可知，政府在掌握媒體方面，佔有絕對優勢。但在文字的工作上却是失敗的，尤其是「中華全體文藝抗敵協會」的機關刊物，在聯合抗日的民族聖戰中，竟然要由國民黨、共產黨、自由人士聯合主編，其實四個主要人物中，除了老舍不是共產黨員之外，姚蓬子是投降的共產黨黨員，代表自由人士的蔣錫金是共產黨預備黨員。可以說已完全由共產黨控制了。國民黨主管其事者，竟渾然無知，一九四九年的大潰敗，也就不是甚麼意外了。

左傾文人隨心所欲

「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於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八月，丁玲出任首任團長，吳奚如為副團長。該團曾過黃河到山西西安，以及西北的戰地，如晉察冀等地，演戲與文化服務。後來吳奚如調回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出任周恩來的秘書。很多文藝上不能解決，或需要做重大決策時，都由他向周恩來反映。可以說，吳奚如當時是共產黨在所謂「白區」（按指政府控制區）文藝方面重要決策人之一。

「戰地」這本刊物，是在一九三八年以「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名義創辦的。經費來源，則是政府撥付給延安共軍的經費，共產黨根本不匯去延安，大部分用在「國統區」（政府區，也同白區意義相同）支持共產黨的活動，譬如某人因共產黨嫌疑被追捕的共產黨員生活的補助，創辦刊物以對付國府等，都是用政府撥給的經費。這在當時也是很滑稽的一個怪現象。

「戰地」由舒羣、丁玲掛名聯合主編。丁玲離開戰地服務團，即被調到延安的「馬列學院」學習，根本沒有回武漢。

這種情形，丁玲自然無法執行編輯的工作。表面看起來，很像舒羣利用丁玲的名義來招搖。胡風對這種事，深不以爲然。

事情是這樣引起的：

丁玲從延安寫信給胡風，並把朋友的稿推荐給「七月」。胡風本要揭發舒羣以丁玲名義招搖這件事，這下機會來了。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八月號三〇六期黃天邁「長憶亡妻張雅南」文中一二四頁中段誤植數字：「婚後在棉蘭」，「棉」字誤爲「揚」，題詩「君真奇女子」「真」字誤爲「算」字，「舌翻擬于謹」，「謹」字誤爲「謙」字，特此更正，並向黃先生致歉。

△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掌故趣談，現代史話、懷舊憶往等作品爲主，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如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本誌積存待刊遊記文稿甚多，一時無法刊出，作家們今後撰寫遊記山川勝景時務必兼及人物掌故、要有可讀性，永久保存價值，否則請勿寄來。

△大陸作家來稿，務請詳細參閱稿約，儘量少用簡筆字，少用傷害兩岸任何一方之政治性詞句，請多合作，謝謝！

胡風把丁玲的信，和推荐的稿子一起在「七月」發表，並在按語中暗示舒羣冒用丁玲的名字這件事。舒羣對胡風的挑剔，自然非常不愉快。但這是事實，也無從辯解。一生氣，要停辦「戰地」，經蔣錫金等人調解，也未能使倔強的舒羣釋懷。後來「戰地」只辦到第六期就停刊了。

是「八路軍辦事處」所交付的任務呢？還是蔣錫金的環境較好？據陳紀濤的回憶，當時向後方逃亡的作家，不少人住在蔣錫金家。羅烽、白朗、胡風都是蔣府的坐上客，由他來調解這件事，照理應是水到渠成才是，其實不然。舒羣是黑龍江人，個性倔強；而胡風自視極高，在「兩個口號之爭」中，對周揚都不稍讓，以魯迅一派掌門自居的胡風，不把舒羣放在他的眼裏，是很自然

的事了。

舒羣對於胡風的高傲與對付「戰地」的事，一直耿耿於懷，伺機報復。文章是寫不過胡風的，暴烈的舒羣則訴諸武力。

據蔣錫金於一九七九年，在「新文學史料」季刊第四期上，回憶這段往事。他說：「在漢口市的交通路，上海雜誌公司門市部相遇，便爭吵起來。舒羣要毆打胡風，被大家拉開了。」

這一架沒打成，可是「舒羣決意把刊物停辦」。蔣錫金說：「這刊物當時銷行萬份以上，較有影響，所以大家勸他繼續下去，從第二卷起，把丁玲的名字取消，作一些說明也就算了。但舒羣堅決不幹，勸說無效，刊物便停了。」

這裏有些疑問，蔣錫金在他的回憶裏說，只

辦了六期，那時十二期是一卷，怎麼又說「從第二卷起，把丁玲的名字取消」的話呢？這顯然是矛盾的。六期不能算一卷，我判斷那是當時向舒羣的建議，而不是雜誌已辦到第二卷。

按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由南京遷漢口、長沙、重慶等地，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廿四日政府宣布放棄武漢為止，政府遷武漢總共只有十一個月，斷無辦到二卷的道理，顯然是蔣錫金在回憶中沒把話說清楚，「從二卷起取消丁玲名字」是計劃中的事。

時下辦刊物、編輯、編委刊了一大堆名人，有的甚至在國外，如按胡風的標準，似乎都在招搖了。

中共對文學，自始至終，都有嚴格的控制，可說，文藝是中共的另一支八路軍，替中共打下半壁江山。「左聯」控制到了「關門主義」的程度，非其族類不得其門而入，進去以後也出不來。「左聯」的解散，與此有相當關係。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的那個「文藝小組」每星期都要開一次會。蔣錫金在回憶裏說：「會議總是從戲劇電影、音樂歌詠、文藝報刊的情況開始，前兩者少些，後者多些，談到的事情不少。」而不能解決的事，由吳奚如向周恩來請示解決，足見中共對文藝活動的重視。

在武漢期間，文協要辦自己的機關刊物，編輯人選經協商後由姚蓬子、樓適夷、蔣錫金三人負責，但是樓適夷以「姚蓬子為人鄙劣」而加以杯葛，大有「有你無我」的態勢。這件事，也是由周恩來裁決，要樓適夷忍耐，他才就此編輯職

務的。

姚蓬子即姚文元的父親，本是老共產黨員，曾加入「左聯」。一九三三年因共產黨嫌疑被捕。後來宣布脫離共產黨才獲得釋放。不過宣布脫離共產黨，是共產黨人監獄鬥爭的方法之一，認眞不得。但共產黨却認爲姚蓬子投降，並在政府的情報機關做事。事實上姚蓬子這個人也是反覆覆的。他曾用狄克這個筆名批評過魯迅，後來在「文革」期間成爲他們父子的罪名，也可以說是自食惡果吧！

獨女得償探父之願

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是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卅日出版的「十日談」第三十期，大概這就是樓適夷所指的劣跡了。姚蓬子宣布脫離共產黨以後，擔任國民政府情報工作是有可能的。情報機構招降納叛的事例很多。譬如曾因被捕而與丁玲生過一個女孩的馮達，他原是史沫特萊的秘書，被捕後在南京拘留中與丁玲同居，互相愛憐，後來丁玲逃走，馮達一直在某情報機關做事，到台灣後，調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前些年馮達病重時，他與丁玲所生的女兒蔣祖德，曾透過特殊管道到台灣探視父親的病，作家方雪純（湘靈）曾與蔣女有一面之緣。因爲蔣女既是透過秘密管道，故未曾曾在台北曝光。蔣祖德留俄學舞蹈，是有名的舞蹈家。胡風、舒羣的衝突，幾乎大打出手，爲丁玲而起。丁玲這位女作家浪漫風騷，見一個愛一個，閱人多矣！不過這都無損於丁玲在文學方面的成就。

別人賺錢她當褲子

到底丁玲在文學上有甚麼成就？一九五二年她以「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書獲「史達林文藝獎金」二等獎，頒給五萬盧布。一般人認爲這種獎，並不足以代表寫作的成就。因爲那是一本歌頌共產黨「土地改革」的作品。但無論此一獎金具有甚麼意義，在數億人口中，能脫穎而出，並在蘇聯作品競爭中獲獎，仍是件不容易的事。沈從文曾經是丁玲的老友，丁玲也愛過沈從文，沈從文在丁玲被捕之後，寫下「記丁玲」，縱使其中還多少挾雜了些感情在內，因爲沈以爲她已死在獄中，對一位死去的人的批評，沒有必要去造假。

沈從文在「記丁玲」裏，怎麼寫這位二十幾歲，不會調理生活的女孩子呢？

他說：「丁玲女士的名字，在北方、在南方、在黑暗中，皆被一些年青（按照原文，青應爲輕字）人用一種親切的友誼加以注意，成爲一個非常順耳的名字。在黑暗中一出版，作家間亦無人承認『這是國內一種嶄新的收穫』，這收穫又顯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代的作品標準，另向一新方向上展開與突進的。」可見沈從文是如何重視丁玲。他把當時的女作家中做了個比較：

冰心（謝冰心），因疲倦於寫作，擱筆了。沅君（馮沅君，筆名淦女士）寫作「隔絕之後」的時代已經稍稍過去，努力研究詞曲去了。淑華（凌淑華）明白了她的所長當在繪畫，埋頭於宋元臨摹，不再寫小說了。

蘇雪林、陳學昭雖各把握了一部分女性讀者，較之丁玲女士作品籠罩一切處，則顯然無可頌頌，難予並提。

由沈從文的描寫中，大致可以瞭解丁玲那時創作之勤奮與她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雖然沈從文與胡也頻同時愛過丁玲，畢竟文章是要公開發表的，既敢公然與前揭的作家做如此的比較，離事實總不能太遠。當時沈從文已薄有文名，以他的性格，絕對不會以自己評論的聲譽，做如此的賭博式，感情用事的捧丁玲而打壓其他作家。故沈從文的說法可信度極高。

從這點去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獎並非因為她是位女作家，也並非那是一本歌頌共產黨「土地改革」的極左作品而得獎，多少還是有些道理的。因此不能以她在感情上、婚姻上、生活上的態度而抹殺丁玲在文學上的成就。以作家而論，她有一定的地位。

這位女作家，不會調理自己的生活，如從一個家庭主婦的角度去看，她顯然是不及格的。從她理財上可以看到丁玲的浪漫。那些浪漫的生活，頗有詩人生活的趣味。

她在一九二四年從北平到了上海，生活立即受到威脅。一九二六年二十二歲的丁玲寫信給洪深想當演員，只做了幾天，就受不了在水銀燈下的煎熬、與不習慣那種打情罵俏的生活而退出。好像丁玲是多麼嚴肅，其實她自己的婚姻，就是一部電影。

「當電影演員也並非易事」，她如此說，只是找個退出電影表演的台階罷了。

她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呢？

爲了每月付房租到期，便趕忙寫小說，寫成時就送到可以拿錢最方便之處，也就是有熟人，又可以預支稿費的報刊雜誌。從編輯處取得了通知單，又從會計處或營業部換得了一疊鈔票，得錢後，兩人或一人在街上買了東西回來。

沈從文對胡也頻、丁玲這種生活有如下的描寫：「大街上各種商店的臨街大窗櫺內，陳列了種種貨物，皆常常把這個路上人（按指丁玲或胡也頻）吸住，且即刻誘入鋪子裏去，等待出門時，錢夾中的鈔票減少了。錢少了，脅下自然就多了一個盒子，盒子中或是可吃的，或是可穿的，或是可以擺在窗櫺上的，總而言之則大多數是兩人不必需的。」買的，都是並不適用的東西。這是一種無謂的浪費，胡也頻買東西送愛人丁玲，丁玲又買東西送丈夫胡也頻，當欣賞完了那些新買回來的廢物，歡喜了一陣子之後，才發覺新領來的稿費已經不够付房租了。怎麼辦呢？再把那新買的衣料什麼的，又匆匆到康佛路、馬浪路、貝勒路上，鑽進當舖，當了當回來付房租。

這樣的事，還不止一次兩次，沈從文說：「一種有秩序的生活，似乎正在有意識的逃避這兩個人，故總永遠使兩個人同小孩子一樣。」於是丁玲這個人，便「早把一個婦人所必需的家務趣味與娘兒們計米較鹽屯私房賺小錢的婦人當然性情失去。故兩個人同時把成爲俗人的機會也失去了。」丁玲、胡也頻之所以不同於俗人，正因爲他們是作家。沈從文所謂的俗人，也就是正常人。一面浪費，一面要應付如烈火般煎熬的人生

活，是良性循環，還是惡性循環，對他們是很難分別的。生活的鞭子抽打着他們，作品的產量也增加了，當然很快的有名氣了。如果沒有這些壓力，他們可能沉浸在愛情裏，永遠都不會去寫作，也不會工作。如果他們不浪費，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作品。如此往來，那種性格，反而造就了丁玲今日的文學地位呢？

當時上海的文化事業如何？有關二十、三十年代報導，上海的情況是，「若干讀書人視新書業爲利藪，各就手腕之修短，集股開辦大小書店與刊物，各個書店刊物編輯人皆算不介於勞力與資本家之間，編輯人莫不有一面淵源。」丁玲與胡也頻也都能把握這個機會，在生活督促寫作的互動關係之中，用全力寫文章，之後又花錢去買那些不必要的東西，要用錢時，才又把那些東西送進當舖裏換錢來應急。

丁玲的生活與寫作，便是在這一連串的循環中推動下完成的。

因爲上海的出版業蓬勃發展，丁玲、胡也頻等集資共同辦了個「紅與黑」雜誌，但所有的出版業都賺錢時，他們却賠得當了褲子。這與他們不懂得計算有很大關係，「紅與黑」成了短命的雜誌。

反叛性格益見偏激

他們在北平也上過當舖，在北平三十里外香山山上，他們曾經絕過糧。所以一到了上海，丁玲便急著出名，而誤鑽進電影圈裏。她自電影圈出來以後，寫成了「夢珂」，那是她進入電影工

作的一個經驗推展開來的著作。

自從進入「左聯」，丁玲與沈從文對於國民政府的認知上有了極大的距離。他們從山東逃到上海以後，就躲在租界裏。三十年代作家言論都極為尖銳火辣，不要以為作家都不怕死，最主要的原因，由於租界的庇護，使他們胆子大起來，包括魯迅都是如此的，動不動就跑到內山完造的書店裏躲避追捕。

因為這種不同的認知，感情自然也就疏遠了。當沈從文想瞭解他們一些生活、思想、行為時，他們支吾其詞的對付，當沈從文把他知道的一些真相與他們交換時，不是規避就是對立。他們這時的思想已經相當的左傾，甚麼話都聽不進去了。

胡也頻在上海警備部龍華行刑場槍斃以後，丁玲也變成了共產黨員，帶著叛逆性的這位湖南女性，走上反政府的不歸路。青少年時期的反叛是沒有意識意義的，那只不過是追求時髦罷了，胡也頻之被殺，才是她扮演反抗角色的關鍵因素。

那一代，湖南出了不少傑出的女性，就文學而言，謝冰瑩、丁玲奔出湖南的過程幾乎是相同的，兩人都同時左傾過，謝冰瑩被北平左聯的籌備會開除後，即站在丁玲相反的立場。關於謝的被開除原因，至今還不明白，是否為國民黨埋進共產黨內的一顆種籽，或者另因其他原因，當時的籌備委員還有人在，不難查出。不過在那混亂的年代，很難拿過去的行為作為現在判斷一個人的標準。

丁玲這位作家是有很高的才華的，無論她是甚麼政治立場，都不能抹殺她在文學上的成就，

正如我們不能因政治而抹黑魯迅一樣。當然這個比喻未必恰當，兩人成就雖然不同，但類型是相同的。這些往事，只能當成野狐禪來聽，認真不得。不過我寫這些，倒是抱著嚴肅的心情來從事這項工作的。除了資料缺乏，無法參證以外，盡可能接近事實，倒是白紙黑字的事，不能不認真。

高齡病逝埋葬恩怨

三十年代作家中，有許多軼事可談，正式歷史有人去寫，今後我們只寫一些有趣的事，供茶餘酒後的助談而已。關於丁玲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中，也是被批鬥的作家之一，由於他與楊開慧、徐立特、向警予、彭德懷等人的關係逃過一劫。在四月的整風總結中，毛澤東說：「三八節有感覺雖然有批評（按指批評中共），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說了這番話以後，又找丁玲私下談話，毛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長處，肯定優點，再談缺點，人家就容易接受了。」

除此而外，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讀了丁玲的「田保霖」，歐陽山的「活在新社會裏」以後，還寫了封信給丁玲與歐陽山。毛在信裏寫道：「丁玲、歐陽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風慶祝，合作社會要我講一次話，毫無材料，不知從何談起，除了謝謝你們的文章之外，我還想多知道一點，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傍晚擬請你

們來我處一敘，不知是不是可以？敬禮，毛澤東七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見作家是經常的事，艾青、蕭軍、丁玲等都曾在窑洞裏與毛長談過。由此足以看出毛澤東對文學，在民心士氣上的影響，有相當深刻的認識與重視。

巧妙騙術保存實力

他不僅與他們見面，有時是徹夜長談，不少政策上的形成，也徵詢過作家們的意見。舉例而言，「在延安座談會上講話」，就會經分別與臧克家等人談過，問他們這樣提出來，會不會有問題等等。不管毛澤東接近作家是真是假，尊不尊重他們，文藝政策有沒有他們的意見，至少作家們常接近他寫的「某某，請晚上來一談」之類的條子，使他們有被尊重的感覺，這大概就是不少作家、知識分子（如民盟、民革份子）受他驅使，心甘情願的做他的馬前卒的原因。

不僅是毛澤東如此做，周恩來在漢口、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也常常接近作家，並且做轉達延安的政策，策劃在文學上的鬥爭的工作。「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後，政府對左翼作家開始注意，凡已經曝露身分，有立即即危險的作家，不是給他們的生活費，暫時躲避起來，就是給他們旅費，逃到香港，或新四軍的地盤裏去。香港快被日本佔領前，撤退香港左翼作家的工作上，廣東的東江縱隊動用兵力護送作家到桂林，皖南等地。這些工作固然為共產黨保存實力，表面上却是對作家關懷的。縱然被騙，也是巧妙高明的騙術。（未完待續）